

社会纵向分工及其行为准则

□ 谢 闽

内容提要 社会分工体系一方面可以从有形的劳动工具的使用进行观察,这是社会分工的水平维度,另一方面可以从水平分工条件下所进行的人际协调行为观察到,这是社会分工的纵向维度。纵向的社会分工指向人际间协调行为与人际间利益,有专门的伦理以及职业化的人际协调者群体,并有关于相对整体的知识支撑。在加入了纵向协调活动之后形成的二维的分工体系中,人际协调行为的准则被中国古人总结成“为无为”,即要求人际协调行为应该促进分工收益的增长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实现。

关键词 社会纵向分工 人际间利益 相对整体 为无为

作者谢闽,江西财经大学讲师,博士。(南昌 330013)

人类对物质财富追求的无限性与现实财富的有限性这一对矛盾的解决方法无外乎两种:一是进入整体,二是进入宗教。进入整体的意义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主要依靠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以分工提高个人与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进入宗教的意义在于依靠观念中的无限存在(集中体现为神的存在),在人的精神层面上缓解现实中物的有限性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①在中国文化中,宗教的意味淡一些,整体的意味浓一些,西方文化中则与之相反。^②

一、纵向社会分工与人际间利益

劳动分工所反映的是不同劳动者从事各种存在质的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劳动这一社会事实。^③通常,技术层面的分工所指的主要是不同的劳动者使用的不同的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者与劳动工具的不同结合方式。劳动中所使用的有形的工具局部地、非连续地反映了其对应的生产中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知识,这是人们理解技术分工的知识基础,而科学技术知识本身的系统性与劳动工具的非连续性提出了对劳动分工进行协调的要求。对分工

之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际协调首先是通过工具协调的共同劳动,当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时使用同一件劳动工具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由这个工具协调起来;当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相互配合的工具的时候,工具之间的相互配合就实际地使人们的行动协调起来。协调分散的人类劳动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市场机制组织异质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换,理性的个人在(竞争性的)市场价格信号引导下行动,从而通过市场机制使经济活动协调起来。但是以劳动工具为代表的协调方式的容量是有限的,复杂的工具系统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到同一个企业中工作,而实际上社会规模要远大于此,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对更大范围内分工的经济活动进行协调成为必然。以市场这种社会机制来协调分工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市场交易在人际间分割利益是一种不完全的分割,外部性、公共物品等仍然在市场体系中存在。^④

劳动工具和市场机制都是非人格化的社会分工的协调机制,它们存在的不足使得人格化的协调机制成为必然。一种对分工条件下的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社会活动——人际间协调——应运而

生,这一行为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分工深度以及交换的密集程度的增加而逐步成为一种高密度的活动,使偶然的人际间协调行为最终转化为经常化的行为,甚至固定在某些个人身上,使这些人专门从事人际间协调,从而向职业化方向演进,成为另一种独立的社会分工。这一社会分工强调的是社会的组织方面,其劳动对象不再是自然或者自然的衍生物,而是水平分工中的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本身,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需要协调的利益与行为。人际协调者通过观察和理解水平分工中的劳动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之加以协调,从而保证水平分工下的社会生活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运行。如果将以劳动工具为基础的技术层面的分工称为水平分工,则对水平分工进行协调的分工可以称为纵向分工,水平分工与纵向分工形成一个有机的、二维社会分工系统。^⑤

分工促进收益增长,这是一个传统的命题。^⑥对于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增长,通常有两个观察角度,一是从个人的角度,观察个人收益因进入分工而得到的增长,二是从整体的角度观察社会中的各类组织的存在,也就是说社会中存在一类由相关个人组成但是又独立于任何组成它的个别个人的整体,它们是在保持个人收益不变的条件下,相关的人际间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增长的容器。理论上,对分工带来的收益增长由“社会租金”^⑦和“剩余(价值)”这两个概念来反映。这些收益由分工带来,但是没有归于分工中的个体,而是留在人际间,成为人际间利益。^⑧作为因分工而增进的那部分收益的人际间利益,隐含着人际间关于利益的冲突。这一冲突在任何分工的社会中都存在,对这一冲突的解决,有意识地利用社会的复杂性进行“愚民”是一种简便易行办法,^⑨其实质是使分工中的个人观察不到因分工而形成的收益增长,从而也就放弃对这一利益的追求。第二个办法就是形成公共利益,^⑩使不易分割的分工收益存在于人际间,不去分割它,形成人际和谐的成本。

对人际间利益的观察使观察者取到了一个高于个人的整体角度,但是这一角度又不同于通常观念中的绝对整体,而是一种相对整体¹¹,是实践中存在的、有界的、由一些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经济或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组织在思维中的反映,这些组织在现实中表现为家庭、企业、国家等具体形态。人

类的生产成果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土地、劳动、资本是基本的生产要素;¹²在分工久经讨论之后,作为相对整体的组织本身也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¹³成为财富生产效率提升的基本源泉之一。人际间利益是相对整体存在的利益基础,而纵向分工下的人际协调行为是相对整体的行为基础。于是,以相对整体为核心环节,将整体中人际间协调行为与人际间利益直接联结起来,使纵向分工成了增进财富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

二、支撑二维分工的知识体系

联结利益与人类经济行为的是人的理性,当理性在利益与行为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的时候,需要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知识提供的支持,知识包含了个人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同时它还包含了信念。相对整体有它独立的知识形态,支撑着个人理性地选择相对整体,并在这一整体中生存与发展。在从个人走向整体的过程中,理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理性的这一作用还需要靠知识来支撑,因为人们很难从个体直接地推断整体,关于整体的知识是整体得以存在,甚至获得强制力量的一种原因。¹⁴

分工使社会中的个人之间产生了有机的联系,使社会存在成为可能:有了分工,个人才摆脱孤立状态。分工代表着人类整体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深化,以及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深入化;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分工使个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困难。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个人在社会面前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地位,不再能从一般意义上主导社会关系,甚至连认识这个复杂的社会关系都出现了困难。当代社会的很大部分,对于其成员个体来说已经变得难以理解,所以知识角度的“愚民”成了这种分工深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果的一个必然部分。¹⁵同时,分工社会中的协调日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一种严峻的挑战,社会需要一个能够跨越不断增加的匿名性的非人格化的桥梁,也就是说人们需要一个关于分工的社会整体的知识来应对这种挑战,这种知识集中体现在人际间利益与人际间协调行为的性质上,而依据这种知识进行的人格化的人际协调行为是社会本身的要求。对水平分工加以协调总是由一系列具体的行为来实施的,这一点甚至无法交给

宗教,只能留给世俗的人际协调者;而这些人际协调者不仅是水平分工条件下经济社会过程的协调力量,更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推动者。

实践中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所带来的复杂性要求社会纵向分工进一步深化,¹⁶以使其在相对整体中实现有效率的人际协调。这种协调活动,在日常的语境中被称为管理或领导,¹⁷这些职业化的人际协调者则被称为管理(领导)者,纵向分工的深化使管理(领导)者成为管理(领导)者集团,并在其中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分工。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以描述为其基本方法,形成了关于管理行为的分类学——即通常所说的管理职能论,反映的是人际协调者职业群体内部的分工状况,蕴含着人际协调行为的基本属性,为广义理论走向狭义理论¹⁸奠定了基础。当然,要想使之成为一种审慎的科学¹⁹,只靠精密的观察、描述和分类还不够,要在事实中找到某些能够带来精确性的概念,可能的话,还要找到测量这些基本事实的方法。²⁰随着理论概念开发的深入,个人、组织、技术、制度、利益、效率、自由等揭示实践中基本矛盾的范畴被提炼出来,这些基本范畴为纵向分工提供了知识支撑。

相对而言,人们对于以使用工具为代表的水平分工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但是对水平分工条件下的人际协调行为却没有在利益与行为的理性联系这个角度上给予好的展开,其中一个原因是,关于水平分工的自然科学知识是高度系统化的,并且相当普及,并且在水平分工与收益增长的关系中,较易于从实践中观察到丰富而普遍存在的事实来展开“利益——知识——理性——行为”这一逻辑结构;但是,用以支撑纵向分工的知识体系在这个方面则相对要弱一些;另一个原因是基于自由、平等、互利的社会观念与水平分工高度相容,以此为社会观念基础的市场交换机制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深入的理论展开;而作为纵向分工的人际协调行为却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必不可少的强制属性,这与主流的社会观念相冲突。

三、人际协调者及其伦理

纵向分工所指向的行为的基本载体是作为相对整体的组织,是一个利益、行为、知识的统一整体,具有人格特征。这一人格化的相对整体在行动

中的代表者就是纵向分工中的人际协调者,²¹在理想中,他们是知识的卓越者,也是道德的卓越者,是能够实现中国儒家“尚贤推德天下治”²²理想的人。

最早对丰富的人际间协调行为的直接记述是文明之初流传下来的帝王将相的故事,这些故事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冲突,以及对这些冲突的解决方式,这些最早的人际协调者直接把握了其所从事的社会纵向分工行为所面对的整体,他们的行为展示的是对相对整体中的基本冲突的把握方式。中国早期有可靠的文字材料详细记载的黄帝、尧、舜、禹等可被看作职业的人际协调者,²³在古希腊文明中的执政者也是典型的、职业化的人际协调者。²⁴这些人是当时社会整体的代表,代表可以观察到的相对整体——一个部落、一个城邦或者是一个国家。这一代表性,使他们被称为“圣王”²⁵,与道、天、地有同等的地位。²⁶

具体的组织在社会中存在之后,人们就对它们提出了伦理要求,即组织伦理。组织伦理是关于组织这种相对整体本身在社会中的伦理意义,体现的是人们对于小于社会整体的社会中的组织,如政府、家庭、企业等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行为规范、组织间以及组织与个人间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人际协调者通常直接而且密切地与这一伦理结合在一起,其职业伦理就是要求以其职业行为体现这一伦理要求。一方面,人际协调者应当具有高度的道德修养和深邃的智慧,能够在利益与行为等重要方面把握好个人之间、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代表者²⁷;另一方面,治国需要特殊的才干,都是“非圣人莫能尽”²⁸的。对人际协调者的要求实质上是对一个理想的整体代表者的选择和评判标准,对人际协调者的选择与评价机制规定了一般的社会个体与代表相对整体的人际协调者之间的关系,实践中对人际协调者的选择机制,蕴含着的某种形式的民主愿望与思想,是对人际协调者的最终约束。相对而言,将人际协调者分成若干个层次的评价机制比对他们的选择机制弱一些。

人际协调者的伦理受到反映整体与个人间关系规律的约束,以此来解决对人际协调者的约束问题时遇到的用一些人来约束另一些人这一循环。在人际协调者对整体的代表性之下,其行为

必须体现和遵守整体理性原则,即必须守“道”,循道而治是人际协调这一行为的基本规范,也是人际协调者整体代表性的合法性保证,守道而使一个人能代表整个的社会。²⁹人际协调者所遵循的整体理性是以人际间利益为基础所进行的理性计算,在对整体的代表性的基础上,这些人际协调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运用某种社会所能接受的强制力量,即使用“法”这类工具。人际协调者个人所代表的整体的理性通过代表者的理性来体现,人际协调者理性是整体理性的一种实现形式,从而整体有了与个人同样的理性能力的代表。这里主要的冲突是,进行这一理性计算的人本身也是个人,“圣王”必须在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个人的伦理与整体的伦理之间进行平衡。这时,人际协调者的伦理需要考虑的是,首先,将对其个人的伦理要求与对其职业伦理要求等同起来,³⁰并且强调人际协调者对整体代表性方面;其次,这种伦理与其特定的行为以及在整体中的特殊处境相关,所以不能以一般的个人的伦理要求来要求人际协调行为。³¹

四、纵向分工下的人格冲突

水平分工和对这种分工的非人格的协调机制——劳动工具与市场机制的协调,往往给人以平等的幻觉,以为在利益与行为上,个人间关系是自由、平等、交换、互利的,最低限度地,个人与作为相对整体的组织间的关系也类似个人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契约关系,不存在整体对个人的强制,个人至少有从整体中退出的自由。但是在纵向分工下,个人与整体的冲突明确起来,平等的幻觉被弱化了,人们真实地认识到,在分工的社会中不会再有孤立的个人,只有代表整体的个人和代表个人的个人。

在整体中个人与整体间关系的展开有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整体中的个人的“我”与整体间的关系,二是作为整体的代表者的人际协调者的“我”与整体的关系,三是作为整体代表的“我”与作为个人的“我”之间的关系。在第一种关系中,“我”是一个特定的范畴,是指个人进入整体之后,作为个人的“我”与作为整体的组织之间的对立关系中的个人。在第二种关系中,在整体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整体间的关系客观上需要协调,而

这一协调行为必然是具体的,需要有一个或者一些人对这些行为与利益进行观察,对组织中分工条件下的个人行为进行协调。这样,在具体的个人与有形的组织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有形的、具体的、人格化的协调者,组织与组织中个人的冲突也就部分地具体化为水平与纵向分工的行为者之间的冲突。第三种关系主要体现的是这个相对整体代表者的内心冲突,是组织中个人与整体之间冲突的人格化体现。这就使社会中的个人同时有着整体人格与个人人格两种人格倾向,并在社会生活中这两种人格倾向会在不同时间或在相同的时间里被唤醒,因而会让个人明确地感受到人格冲突。双重的人格倾向是包含水平分工与纵向分工这两个维度分工系统的社会中人格的普遍特征,职业的人际协调者们会明确地感觉到他们作为整体的代表者与作为个人的自我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单纯水平分工中的职业者们则会感受到自由与效率的冲突。

人际协调者一方面是整体中的个人,另一方面是整体的人格代表,其人际协调行为包含着必要的、合理地对他进行强制的属性,人际协调者对整体的代表属性及其所面临的人际协调行为的强制属性向人际协调者在道德、人格上提出了与其他人不同的要求,这使他们常常面临人格冲突。对于二维分工条件下的水平分工中的个人,在选择进入分工的同时也就选择了接受某种人际间协调力量,以使分工的社会得以存续,对人际间利益存在和人际间协调行为的理性态度,也体现了其人格冲突的一面,即既要坚持平等、自由、交换、互利等主流社会观念,又要接受包含一定程度强制的人际协调,自然,其人格中也就包含着个人侧面与整体侧面。

人际间利益的存在是对这种人格冲突的一个解决方案,给整体与个人之间的严厉冲突一个缓冲的地带。人际间利益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公共利益,凡是在公共利益存在的时候,道德的性质就会突显出来,因为它必然会要求相关的个人表现出某种牺牲和克制精神。³²一个简单、但也是极端的从整体与个人的严厉冲突中走出来的办法是“无我”,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人际间利益为核心的整体利益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二维分工下的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行为总是存在某种整体属

性,从而在相应的程度上遵从整体理性——“道”的要求行事。如果以“人性本恶”³³为起点,为了使整体与个人的关系达到某种和谐,压制“我”,以严刑重赏达到相对整体中的和谐也是一个办法。这种大力地压制或者以利来诱导和以罚来管制个人的办法,其实质是一种“鄙我”。对于纵向分工下的人格冲突,“大学之道”则指出圣人与常人的人性是一致的,常人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进德修业而成为圣人,同时提倡用“法”、“礼”来规范人际间关系,从而使社会中的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圣人的行为特征和道德光芒。“大学之道”指出了常人与圣人达到人格统一的实践途径,³⁴即常人可以通过道德修炼向圣人的境界靠拢。这一解决办法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紧张关系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更是对“愚民”策略的一次重大的修补,使已经认识到整体利益的个人能够更有效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整体关系。这些在中华民族的思想中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国人的整体主义观念,集体主义精神大约都与此有关。

五、个人选择与理想的整体

人际间协调行为以相对整体的名义实施、并以相对整体为其展开的基本载体,人们在这种行为面前感觉到整体的存在,整体中的个人行为也就包含了整体的属性,一部分利益留存在人际间成了人际间利益,具备了整体利益的性质,个人与整体基于利益的冲突也得以展开。

相对整体是理性的个人选择的结果,这一选择的基本机制是:理性的个人在效率与自由之间进行权衡,从而进入整体。当个人进入整体之后,个人行为特征是在整体内部非价格激励条件下行动的相容性,³⁵这是个体行动的整体属性,而不是整体的行动,只有对水平分工的协调行为才是由个人代表的整体的行动。个人进入整体之后,往往面临着人际间的协调力量对个人利益与行为的一定的制约,这对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减损。这种人格化的协调行为因其强制的特征,不为个人所喜好,这使个人面临着自由与效率的冲突。分工促进社会财富创造能力的增长使自由与效率的冲突有一个积极的解:分工条件下,财富创造能力的增长使得自由与效率可以共同增长。在物质相当匮乏的时候,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宁肯放弃更

多的自由,在极端的情形下,甚至可能出现放弃几乎全部自由而换取生存机会,如奴隶制,但是,人对于自然界的自由随着水平分工的深化而得到加强,这就是人类社会形态不断向高级阶段演进的生产力基础。在财富相对丰富之后,人们观念中的自由的相对价值就显现出来。个人相对于整体的自由,更为主要的是由二维的分工体系本身所创造和保障的收益增长来实现,在这个整体中,人们不断地在面对这一对冲突而展开探索,不断地提高效率,也不断地开创更大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纵向分工带来的收益增长与强制的程度构成了个人进入相对整体的理性选择的两个决定性变量。随着“分工——相对整体——强制——效率——自由”过程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传统观念中以强制为基础的权力演变成了以集体资源为基础的倾向性动员³⁶,越来越多地被以利益诱导为基础的权力所代替。³⁷

在整体的强制属性通过人际协调行为得到明确观察之后,人们设想出了一些无形的理想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基本属性是整体对个人来说是非强制的存在。古代中国人要求理想中相对整体能象水一样育生万物,具备“柔”、“弱”的特征,这是当时规范的组织、理想整体的描述;而以“小国寡民”³⁸作为对于相对整体之间关系的规范陈述。这两者共同陈述了“至德之世”³⁹的标准,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与自然、个人与个人、个人与整体、以及个人的内心中都达到了完美的和谐。⁴⁰

结论:为无为

“为无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在中国被讨论了几千年,在其它的民族中,也有用不同的概念体系陈述的类似内涵的命题,这一命题没有随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而淡化,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不断被现代化。在水平分工中的个人以及纵向分工中的人际协调者都应该积极作为,以实现分工所带来的收益增长,这是“人道”;而对水平分工进行协调时要尊重水平分工的规律性,人际协调应该是“无为”的,这是“天道”。“无为”是不先物之所为,而“有为”是因物之所为,⁴¹也就是说纵向分工不能任意地干预水平分工,但

又要协调好水平分工,从而达到“有为”与“无为”的统一——为无为。这是纵向分工中人际协调行为所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⁴²反映了对人际协调者有效地协调个体间以及个体与整体间冲突的要求。“为无为”原则的实现首先要维持“无为”的基本状态,这样才能将整体与个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稳定下来;只有尊重个人价值的整体才有可能在个人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其次,“为无为”原则要求有所为,为必需之为,是一种有边界的主动行为,以实现整体对于个体的最优干预,达到人际间利益基础上的自由与效率的均衡。正是对于纵向分工所保障和促进的收益增长的把握,人际协调者才得以无为,个人与整体的冲突才得以缓解,纵向分工条件下个人的人格才得以稳定,而人际协调者则能象天平一样⁴³,在整体中协调与平衡个体间的冲突,使整体内部的和谐得以实现,从而达到“无不治”⁴⁴的境界。

注释:

- ①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王太庆译,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③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0页。
- ④谢闽:《和谐的成本》[博士论文],江西财经大学2005年版。
- ⑤《孟子·滕文公上》将劳动分为劳心与劳力,以劳动为枢纽,在社会阶层间建立起纵向的联系,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认识。而劳心的治人,是在人际间进行协调的社会纵向分工的典型说法。这似乎暗示着将劳动按照脑力与体力进行分类,在同一个个体上可能会存在意志与行动相分离的困境。
- 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6页。
- ⑦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韩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 ⑧人际间利益在实践中的存在原因、存在形式等主要在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相关概念中展开。
- ⑨“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第六十五章》。
- ⑩公共利益在实践中的存在原因与存在形式主要由公共消费物品与社会相互依赖成本这两个概念来展开,这两个概念明确地指出公共利益的存在是个人选择的结

果。关于公共消费物品的讨论可以参见: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 36 No 4 (Nov, 1954), pp 387-389 关于相互依赖成本的讨论可参见: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9页。

11 人们对于社会的观察经过省思与抽象之后,形成了整体概念。绝对整体指高度抽象的、仅存于思维中的无限的、道德的观念,有近于宗教的性质,而相对整体指向实践中的具体组织。谢闽:《和谐的成本》,江西财经大学2005版。

12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陈福生、陈振业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7~158,324~328页。

14 谢闽:《知识、理性与利益格局——基于对保险机制的观察》,《科学发展》2008年第8期。

15 而在理论上的网络社会中,关于自然与技术的知识与关于社会的知识已经高度地融合为一体,这是网络社会扁平化的知识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愚民”已经不可能实现。

16 在中国古代,明确的职业化管理者群体所面对的组织是“国”,类似于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描述的古希腊的城邦,这类基本载体足够大了,非一人所能管理。

17 纵向分工下的人际协调行为以个人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整体是个人在自由与收益增长之间进行权衡之后的结果;而管理理论的展开以整体主义为其方法论基础,整体高于个人而存在是管理行为的前提。

18 Ernest Nagel Assump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53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63), pp 211-219

19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一版序言第11页。

20 泰罗找到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衡量个人效率与组织的整体效率的方法,这个方法尽管简陋,但是足以使他的理论脱离了简单分类的范畴,从而达到了“学”的高度,从而使广义的管理思想走向了一个紧密的命题体系,走向了狭义的管理理论,也使他个人也成了管理学之父。F·泰罗:《科学管理原理》,蔡上国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

21 观念中的绝对整体不可能由具体的人来代表,而只能由作为一切存在与规律的化身的神来代表。

22 《荀子·成相》。

23 《史记·本纪第一·五帝》。

2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柏拉图:《政治家》, 原江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5 李英华:《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中国哲学史》2005 年第 1 期。

26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故道大, 天大, 地大, 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27 《孟子·离娄上》。

28 《荀子·正论》。

29 《庄子·让王》曰:“道之真以治身, 其绪余以为国家, 其士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 帝王之功, 圣人之余事也, 非所以完身养生也。”

30 “视卒如婴儿, 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卒如爱子, 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 乱而不能治, 譬如骄子, 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篇》。

31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张志伟、梁辰、李秋零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94~119 页。

32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渠东译, 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第 25 页。

33 “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

34 所谓“三纲领”和“八条目”历来被视为是关于“内

圣外王”的经典解释。从“格物”、“致知”到“修身”和“齐家”, 实际上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修身内容, 即“内圣”涵义; 而“治国”、“平天下”都属于政治内容, 即“外王”涵义。

3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40~80 页。

36 丹尼斯·朗:《权力论》, 陆振明、郑明哲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74~234 页。

37 谢闳:《公司政治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6 年第三期。

38 《道德经·八十章》。

39 《庄子·马蹄》。

40 汤一介:《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船山学刊》1998 年第一期。

41 《淮南子·原道训》。

42 刘笑敢:《老子之自然与无为概念新论》,《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6 期。

43 《申子·大体》。

44 《道德经·第三章》。

责任编辑 俞伯灵

(上接第 120 页) 革必定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阻力。因此, 也有学者指出, 进一步深化改革, 必然要触及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 甚至宪政改革问题也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¹⁷。但同时, 学者们又清醒地认识到, 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又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经济危机阴影下的美国地方治理凸显的各种问题, 给这一论点做了一个现实的注脚¹⁸。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 公共管理学者应该以应对金融危机、反思政府角色为契机, 深入研究中国公共管理的现实问题、总结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经验、建立中国公共管理的本土理论。中国不但要能够出口商品、提供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 还应该能够为世界贡献思想、文化和公共管理(学)知识。

注释:

① 郭占恒:《坚持党政科学有为 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② 12 张敏杰:《金融危机的反思与中国社会政策的路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③ 11 陈剩勇、李继刚:《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 对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 and 改革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④ 张旭昆:《告别经济危机, 警惕社会危机》,《后金融

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⑤ 盛世豪:《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⑥ 王利月、张丙宣:《企业重组、政府作用与市场秩序: 对近年来国内几个钢企并购案的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⑦ 陈剩勇、马斌:《中小企业困局与政府干预: 作用、限度与政策选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⑧ 徐建春:《城市经营: 应对了金融危机, 还是制造了泡沫经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⑨ 徐越倩:《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家角色》,《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⑩ 17 施雪华:《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13 倪星:《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15 王春福:《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政策取向的转换》,《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16 黄红华:《统筹城乡就业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路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18 高新军:《经济危机阴影下的美国地方治理: 对美国马萨诸塞州艾莫斯特地方政府的调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与市场》高端论坛论文集, 2009 11 21

(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Abstract We researched the rural credit market structure, formal credit and farm productivity with the data got from 2008 Rural Credit Market Survey of China. The main purpose of most formal loans farmers got is for the financing of farm production,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government's rural finance policy. We then investigated the performance of Development Finance strategy, and found that formal lo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large farms. Little affect of formal loan appeared for small farm production in our data.

Keywords Formal Credit, Planting Scale, Farm Productivity

Population Aging and Elderly Care in Zhejiang Province (68)

Zhang Minjie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Facing the aging and "all elderly people are to be provided for and enjoy proper car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analyzes elderly care practic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articl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current elderly support system is transformed from sole model to synthesis model, and the key content of care is to transform from low support level to higher social welfare level.

Keywords Aging, Elderly Care System, Social Security, Zhejiang

The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rinciples of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s (75)

Xie Min (Jiangxi Financial and Economic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Abstract The division o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labor tools can be named as horizontal division of labors, while the division of labors observed through the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behavio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orizontal division of labors can be named as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s. Therefore,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can be looked as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s. The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s connects the interpersonal-interests with the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behaviors, professional inter-personal coordinators, specific supporting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ir professional ethics have also developed.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summarized it as Wei-Wu-Wei. It means the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behaviors should enhance and guarantee the individuals' freedom and the growth of the wealth resulting from the horizontal division of labors.

Keywords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s, Inter-Personal Interests, Relative Collectivity, Wei-Wu-Wei

On Political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Social Sound Operation and Its Optimization (82)

Wan Bin and Dong Shitao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Abstract The basic meaning of political adjustment mechanism was to highlight the political and public nature and its goal is to achieve social harmony and sound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 political adjustment mechanism is essential for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society, namel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narrow) system to run well. From a political main reason perspective, laws and policies are the main reason of the exter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morality and religion are the internal adjustment mechanisms, and compromise and tolerance is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between the main rational. To achieve sound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needs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form of political mechanism.

Key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Social Benign Operation, Political Adjustment Mechanism

False Silver Circulation and the Country Dealing with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91)

Huang Anling (History Department, Su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9)

Abstract False silver circulation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is one kind of normal money economy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silver becoming currency, but the country actually failed in dealing with it. The false silver circulation has railed the normal market order, hindered the society commodity money economy benign development, and also reduced the currency silver function in some way.